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叶 紫

Y E Z I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叶 紫 代 表 作

叶雪芬 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

1131117

责任编辑 李允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叶紫代表作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11.5印张265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50册

ISBN 7-5400-0012-0 / I · 15

统一书号：10385·143 定价3.25元

DE 88/17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织编选的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前 言

1933年，青年叶紫宛若夜空出现的新星，引人瞩目地进入左翼文坛。他的创作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文学的战斗传统，紧密配合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的需要。鲁迅曾经赞扬他的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叶紫作〈丰收〉序》）叶紫的战斗的文学，在题材、人物和现实主义诸方面给革命文学增添了新因素，给左翼文苑吹进一股清新的风。

一

在30年代的左翼作家队伍中，叶紫的身世经历是独特不凡的。他的家庭卷进了暴风骤雨般的大革命斗争中；随后又与革命一同经受磨难。这样异乎寻常的人生道路对他的创作既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也准备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从而带来属于他自己的特色。

1910年夏历十月十四日，叶紫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月塘湖乡余家垸。当时他的父亲余达才正在华容水乡教私塾。叶紫就在日益破产的农村中度过了童年。家乡连年水灾的悲惨情景，在他那脆弱的心灵上烙下永生难忘的印痕，以致若干年后，他在小说《丰收》等作品中仍能描摹出那悲惨的景象。1916年，叶紫进兰溪高

等小学校读书。后来成为益阳著名共产党人的袁铸仁、卜息园等当时都在该校任教，他们的学识和为人，曾使叶紫由衷钦佩、仰慕不已。1922年，叶紫赴长沙，先后进湖南妙高峰中学和华中美术学院深造。1925年，积极投入长沙学生运动，受到学运领袖柳直荀、曾三等人的重大影响。

1926年，湖南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叶紫一家都成了革命中坚。四叔余璜为共产党员，在农民运动的“洪流激荡里”，“做了一个主要的人”（叶紫《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以下凡引本文处均不加注），先后任县总工会会长，县农民协会会长兼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在余璜的推动下，叶紫的父亲余达才和叔叔寅宾、姐裕春、也民，都“卷入了这一个新的时代的潮流”，分别担任了县、乡的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的领导人。叶紫于1926年底离开华中美术学院，投笔从戎，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赴武汉之前，他在家乡参与了革命宣传活动，目睹广大农民扬眉吐气，封建地主势力威风扫地，从心底里欢呼“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许克祥也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三湘四水，血流成河。这期间，余璜率领农民自卫军击退反动武装的数次进攻，后向湘西撤退，加入红六军段德昌部（在1932年突围时，与妻郭雄一同英勇牺牲）。达才与也民父女被益阳团防局捕杀。寅宾带领全家老小外出逃难，叶紫的祖母、寅宾的妻子、余璜前妻及其五个子女在逃亡中先后病死、饿死、淹死。

“马日事变”对叶紫一家人是一场浩劫，从此他被迫开始了流亡生活。为了寻求一条复仇雪恨的道路，他学过道，当过兵，讨过饭，做过苦力。严峻的现实使他认识到：这一切不只是个人

悲剧，也是阶级悲剧；自己的仇人不只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反动统治阶级；吃人的地方也不只是益阳，而是整个旧世界；只有把个人的复仇纳入阶级解放的轨道，才有出路。

约在1929年底，叶紫流浪到了上海，并停留下来寻找党组织。不久，叶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卜惠园同回湖南进行革命活动。卜惠园不幸在湘阴被捕，于1930年5月被杀害于长沙。叶紫得到卜惠园化名王世昌从狱中寄出的信后，及时转移，返回上海。1931年春，他以“共党嫌疑犯”罪名被捕，在龙华监狱关了8个月。后由党设法营救出狱，旋即与千里迢迢赶赴上海的未婚妻汤咏兰组织家庭。母亲刘氏也历尽艰辛来到上海。叶紫为了解决一家人生活，到处寻找职业。他做过弄堂学校的教员，函授学校的职员，书店的校对，当过警察，甚至为西林寺的和尚抄写签条。在这艰难糊口的同时，为了寻求安慰，排遣苦闷，叶紫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从旧诗文旧小说“一直读到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以及新近由世界各国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而且能“用心用意地去读，用心用意地去想”，像海绵吸水一样，从中外进步文学中吮吸养分，滋润他那痛苦的心田。于是，他心中郁积的“千万层隐痛的因子”，好像地下奔突的熔岩，在文学上找到了突破口。他决心拿起笔，“去刻划着这不平的人世，刻划着我自家的遍体的伤痕！”就是这样，他闯进了文坛。从1933年6月，以叶紫笔名在《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短篇小说《丰收》起，到1936年10月因病辍笔止，共发表了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近40篇。这是他文学创作的丰收期。

叶紫浸渍着血和泪的身世经历，成为作家的独特途径，影响和决定着他的创作面貌。他的主要作品都是以自身的遭遇为题材，用饱蘸强烈感情的笔触，描绘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和30年代

的农村斗争以及红军的战斗生活。叶紫在《星·后记》中写道：

“因了全家浴血着1927年的大革命的缘故，在我的作品里，是无论如何都脱不了那个时候的影响和教训的。我用那时候以及沿着那时候演进下来的一些题材，写了许多悲愤的、回忆式的小品、散文和一部分的短篇小说。”他向友人诉说：“我现在的的生活，全然不能由我支配。我精神上的债务太重了。我亲历了不知多少的斗争场面……凡是参加这些搏斗中的人，都向我提出无声的倾诉，‘逼勒’我为他们写下些什么。”（转引自满红《悼〈丰收〉的作者——叶紫》）因而，他的笔底震荡着斗争的风雷，翻腾着时代的波涛，创作出来的自然是战斗的文学。

在叶紫的文学生涯中，应该提及鲁迅对他的无私关怀。叶紫从1933年6月参加“左联”起，就有幸得到鲁迅的指教。在鲁迅大力支持下，叶紫与萧军、萧红组织奴隶社，出版《奴隶丛书》。1935年3月，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作为《奴隶丛书》之一，自费出版了，对于冲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在这本小说集里凝聚着鲁迅的宝贵心血：改稿、作序，甚至请人刻插图、出钱购置木刻用板、约书店代售、跑书店算账。而当反动小报诽谤《丰收》时，鲁迅挺身而出加以保护。鲁迅在序言中充分肯定叶紫创作的战斗意义，并且瞩望殷殷：“我们希望将来还有看见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时候。”叶紫则在《丰收》出版后，连连发表新作，并开始构思反映波澜壮阔的湖南农民运动的鸿篇巨制《太阳从西边出来》。鲁迅是一个辛勤的园丁，呕心沥血，悉心培育叶紫这棵文学新苗。当鲁迅逝世的噩耗传来，叶紫因肺结核和肋膜炎并发正在医院里发高烧，他不顾医生的劝阻，伏枕写下悼诗《哭鲁迅先生》，表达了对这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战友”、“伟大的民族的魂魄”的无限悲痛和敬

仰之情。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叶紫挈妇将雏，回到阔别10年的家乡养病，租居兰溪镇小河北岸上渡口老渡伏刘少山的一间茅屋，主要靠同志和朋友们的接济维持生活。在贫病交迫之中，叶紫依然“关心着世界大局，担心着祖国的存亡，关心着全中国的文化事业，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所负的伟大的时代的使命，文化人应尽的一切责任”。他自觉地以笔作枪，“深入后方，散播新文化的种子，用来打击一切阻碍着祖国进步的黑暗势力”（《杂记·笔记·日记·感想·回忆——1939年度日记》）。叶紫以顽强的毅力，在病重体弱的苦境中，竭尽心力写作《太阳从西边出来》和其他诗文。1939年10月5日，病魔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叶紫的英年夭逝，确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小的损失。

二

叶紫的创作由于深深植根于生活的沃土，牢牢把握着时代的脉息，具有明确的创作目的，富有火焰燃烧般的热情，而又得到鲁迅先生的指点，因此能以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了革命文学的战绩。

纵览叶紫的全部作品，不难发现，取材于农村生活斗争的作品，是他创作库存中最为优秀、最为重要的部分；农民的苦难现状和出路问题是叶紫瞩目的中心。他的16篇短篇小说中有16篇是写农村题材的。中篇小说《星》和《菱》（未完稿），以及酝酿多年未能完稿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都是反映湖南农民运动的。

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漫长黑暗的旧社会，他们承受着最苛刻的压迫和剥削。解决农民问题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

命的中心任务。随着五四运动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随着“劳工神圣”口号响彻中华大地，鲁迅率先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农民的苦难，探索农民的出路。《故乡》和《阿Q正传》是杰出的代表。嗣后，一批感受敏锐的年轻作家，受“为人生”文学观念的影响，写下不少农村题材的作品，形成新文学史上所谓的“乡土文学”，例如王任叔的《疲惫者》，许钦文的《石宕》等。但对农民苦难和农村破产的社会根源，“乡土文学”大都未能作正面的或直接的剖析；这些作家多是以同情、哀怜的俯视角度来描绘农民形象的，因而作品的思想内容往往伤于浅露。

在30年代，蒋介石对内血腥镇压革命运动，对外屈从帝国主义，中国更加半殖民地化。军阀混战，天灾频仍，洋货涌入，使农村经济急剧破产，农民群众啼饥号寒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问题成了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中国革命进入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新时期。空前激烈的阶级搏斗迫切要求文学紧密配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应运而生。1931年，“左联”执行委员会为此作出过“决议”。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作家们表现出了弥足珍贵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自觉性，把眼光转向农村，努力描绘农村的现状，虽因对农村生活的不够熟悉，有些作品出现过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但是，这时的农村题材创作同20年代的同类作品相比，日趋绚烂多彩，显得深刻有力。茅盾的《春蚕》和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不但反映了农民的坎坷生活和农村的破产，揭示了酿成悲剧的社会根源，而且表现了农民的不满和觉醒。但是，即使是《春蚕》和《多收了三五斗》，剖析农民的苦难根源和表现农民的觉醒，在把握时代核心、紧随时代步武方面，也还有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春蚕》用一个“洋”字暗示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

国农村带来的灾难，未能正面描写农民苦难的根源；《多收了三五斗》则把矛头指向不法的商业资本，而未能全面揭示农民不幸的原因。至于农民的觉醒、反抗，《春蚕》的续篇《秋收》和《残冬》中只描写了农民的自发斗争；而《多收了三五斗》则只是表现了农民的不满情绪和对斗争的向往。

恩格斯说过：“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同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史讲义〉》）以上我们对以鲁迅为开山祖的从20年代到3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农村题材创作作了一番匆匆的巡礼，目的就在于运用纵横比较，来寻求叶紫的创作在文学上的价值。

如果说，20年代农村题材作品的某些弱点是历史局限所造成，30年代农村题材作品的若干不足是作家生活导致的话，那么，在30年代初期走上文学道路的叶紫，由于历史的赐予，由于生活经历的不凡，能够独树一帜，成绩斐然，也就很可以理解的了。他那一篇篇取材农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记录了大革命时代和土地革命时期湖南农村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和广大农民哀哀无告的痛苦生活以及他们落而复起，前仆后继的步伐，它们表现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斗争，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毫无疑问，叶紫重要作品的取材是当时革命文学最重要、最能反映革命发展情况和社会面貌的题材之一。作品的主旋律，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及其引导下的农民斗争热情的礼赞。这是叶紫选材的角度，也是他的执着的艺术追求。

叶紫的作品也写农民的苦难和不幸，例如《丰收》所展示的是贫农云普叔一家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悲惨场面，集中描写的是“丰收成灾”的农民悲剧。1932年，全国农业丰收，而国民党

政府却向美国借贷40万吨小麦，加上地主豪绅、商业资本的盘剥和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造成“丰收成灾”的畸形社会现象。这样题材的作品，从茅盾的《春蚕》发表以来，屡见不鲜，而《丰收》的描写最富时代特色。它不是孤立地向人们诉说农民的不幸和苦痛，而是把农民的悲惨生活置于30年代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中和土地革命的广阔背景下来展开描写，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探究农民的命运，深刻地揭示出造成农民苦难的社会原因以及农民争取解放的根本途径。作品表明：一个勤劳而有着顽强生活意志的农民，可以战胜大自然的灾害而夺得丰收，却无力逃避阶级压迫所带来的破产。云普叔卖屋鬻女，与旱魃水患拚死搏斗，以巨大代价换取了丰收。他对生活并无奢求，仅仅希望凭借全家辛勤劳动，能“饱饱地吃它几顿”，“做几件衣服穿穿”，“把债统统还清楚”。正当他望着金黄的谷粒编织美丽的幻想时，谷价狂跌，地主高利贷的盘剥和苛捐杂税的涌来，立即把他起码的生活要求击得粉碎。他做梦也未曾想到，丰收给他带来的却是一场新的灾难。全家人血汗换来的150多担谷子，还没吃一顿饱饭，就被一抢而光，还亏欠3担3斗多谷子的捐款。作品把批判锋芒直指国民党政权及其社会基础——地主豪绅。这些家伙上下勾结，狼狈为奸，对农民敲骨吸髓，巧取豪夺。叶紫还在其他小说和散文中着意挖掘陷农民于不幸的社会根源。在叶紫看来，地主豪绅之所以能贪得无厌地占有土地，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鱼肉农民，就因为身后有国民党的政权和武装，例如，何八爷收租受阻，团防局便为他捕杀抗租的农民。叶紫集中抨击的正是这个反动政权和武装的血腥罪行，极力暴露国民党统治的暴虐与腐朽。《夜哨线》揭露反动统治集团置外患于不顾，疯狂“剿共”，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充作“剿共”的战绩。《刀手费》控诉反动政权的骇

人听闻的血腥暴行：青年农民春生因抗租被杀，团防局竟向其母少云嫖索取“刀手费”，迫使少云嫖自尽身亡。《懒捐》反映的是国民党团防局向农民预征民国47年（即1958年，距当时尚有20余年）的田赋，害得农民倾家荡产；农民被诱迫改种鸦片后，他们又来勒索所谓“杂粮捐”和“烟苗费”；农民只得拔光烟苗，而他们却居然向农民征收起“懒捐”来。总之，叶紫以逼真的形象，真实的生活画面昭示出：国民党的国家机器是罪恶的渊藪，是制造农民悲剧的总根；广大农民只有觉醒起来，用革命斗争推翻这个政权，才能有活路。

叶紫以充沛的热情，明确的阶级意识和恢宏的笔力，描绘并歌颂了农民的不满、觉醒和斗争，为千百万农民指明了一条翻身解放的道路。20年代的有关农村作品大都是启示人们在同情农民之余，思索他们的出路问题。30年代有关作品涉及农民出路的描写，一般停留在探求反抗方式或表现自发斗争上。叶紫则给人们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在描写农民的痛苦生活及其社会根源中，预示了农民的反抗斗争势在必行，歌颂了救农民于水火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星》通过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梅春姐曲折的生活经历，从妇女解放这一侧面，再现了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从兴起到失败的全过程，揭示了妇女解放与革命的密切关联。梅春姐是一个美好纯洁的农村少妇，却过着非人的生活。她生活在一个落后闭塞的农村，丈夫陈德隆外貌丑陋，又深受封建思想毒害，总是虐待妻子。家庭专制历来是套在中国妇女命运咽喉上的一条罪恶锁链，《星》的批判锋芒就是指向封建宗法制和夫权的。梅春姐从小受到三从四德封建信条的束缚，对于丈夫的虐待和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总是逆来顺受，忍辱负重。悲哀、痛苦、寂寞像毒蛇一样啮噬着她的心，她悲叹自己是“永远看不见太阳

的人”。《星》的描写如果就此止步，那么它与二三十年代某些反映妇女问题的作品如出一辙，并无新意。然而，《星》向生活的底层掘进，向时代的高度靠拢。在农民运动的急风暴雨中，死水一潭的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的封建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梅春姐这个受封建婚姻百般摧残的青年妇女终于以爱情为突破口，在时代面前挣脱历史的重负，站立了起来。后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梅春姐的新生活毁于一旦，从此跌入更加悲惨的苦海深渊。然而，她经受住了沉重打击，走出家门，“没有留恋，没有悲哀”，“向那东方”，“向那明天就有太阳”的地方走去。这个闪现亮色的结尾含蓄地暗示梅春姐再一次奔向革命，表明梅春姐的精神面貌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叶紫在不少作品中都是以“东方”、“有太阳的地方”暗喻江西的革命根据地的。1940年，李健吾就在《叶紫论》中指出：“当时的东方是江西。”在《星》中，梅春姐命运的浮沉与革命的成败是如此休戚相关，血肉相连，从而有力地表达了只有深入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妇女解放的深刻思想内容。

《丰收》和《火》则以土地革命为背景，通过云普叔悲惨遭遇的描写，揭示农民与地主以及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尖锐矛盾。作品生动地描绘了农民不屈不挠的抗租斗争的情景和如火如荼的暴动反抗的场面，深刻地展示出这场斗争与历史上的农民运动以及当时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息息相通的内在联系，从而表明这场斗争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势，揭示了这场斗争的阶级实质和时代色彩。

任何一个大的社会变动的到来，都有可能在背负因袭重担的老一辈和敏锐进取的青年一代之间形成因认识的差异而导致的冲突。不少中外作品描写了各式各样的“父与子”两代人的矛盾，

就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丰收》在描绘剑拔弩张的阶级对立中，也交织进云普叔与立秋之间的思想冲突，但是，30年代的时代潮流决定了这对父子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必然是父辈的逐步觉醒。云普叔由反对到参与子辈的斗争，表明农民或早或迟都会认识到斗争是唯一的出路。显然，叶紫笔下这种“父与子”的矛盾包含了丰富的时代内容，显示出作家的现实主义的深刻性。

以上这些出色描写，同类作品能与之比肩者实不多见。《丰收》问世不久，茅盾便热情评论说：“‘丰灾’是近年文坛上屡见的题材，但是我们要在这里郑重推荐《丰收》，因为此篇的描写点最为广阔，在二万数千言中，它展开了农事的全场面，老农的落后意识和青年农民的前进意识，‘谷贱伤农’以及地主的剥削，苛捐杂税的压迫。这是一篇精心结构的佳作。”（《几种纯文艺的刊物》）茅盾的评述深中肯綮，并非溢美。

从《星》到《丰收》、《火》等，叶紫为我们勾画出一幅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时期云起龙骧的湖南农民斗争的巨幅历史画卷。这些作品，把农民的反抗与党的活动、红军的战斗交相辉映，站在时代的高度上，描绘出农村的风云变化，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这是叶紫对于新文学史的重大贡献。

三

我们说叶紫的重要作品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歌颂了革命斗争，还因为它们塑造出了一批表现时代特征、焕发时代光泽的人物形象。

农民具有勤劳善良的美德，但因落后生产方式和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又存在着阻碍自身解放的落后性。20年代不少取材农村的作品，着意描写农民落后的一面，表明启发农民群众觉悟的重要性。阿Q便是一个落后的农民形象。鲁迅含泪挞伐阿Q身上的落后性，特别是他至死都没能摒弃的精神胜利法。茅盾所写《春蚕》中的老通宝也是一个落后农民的典型。但《春蚕》又塑造了多多头的形象，并以多多头的先进批判老通宝的落后，从而显示农民的希望。多多头在《秋收》、《残冬》中走上自发斗争道路，老通宝却始终未能幡然觉醒，最后在现实打击下悲惨死去。

叶紫塑造的农民形象独具一格，别展新颜。他虽然也真实地写出了传统意识和陈规陋习以及封建迷信对农民思想的毒害，表现了农民特别是老一辈农民的愚昧落后（诸如《丰收》中所写的抬着关帝爷祈雨等）；也充分地写出农民的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奴隶性格和人生哲学（诸如云普叔坚信“有做便有吃”，反对儿子抗租抗捐，对剥削阶级抱有幻想等）；但是，涌现于他的笔端的老一辈农民大都在事实的教训下，逐步觉醒，走向斗争。他们的性格明显地镌刻了时代的印记。他们是灾难深重的农民，但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云普叔脑海里浮现出“农民会”的影子，从中获取了力量，在攻打地主何八爷庄子的暴动中跑在最前面，最后上雪峰山与红军汇合。农民反抗的涓涓细流，汇进土地革命的滔滔洪流，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真实。叶紫的作品因为有这些描写而放射出耀眼的时代光辉。

在老一代农民中，《向导》中的刘嫵妈是新文学创作中鲜见的英雄母亲的形象，与迟迟觉醒的云普叔不同，与杨七公公（《杨七公公过年》）更不同，她是个具有一定阶级觉悟的农